

# 兵

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谋略典籍。这些典籍多方位、多视角地记载着我们的祖先对社会竞争各个领域的观察、思考、实践和总结。随着人类历史的推移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典籍不仅没有被埋没，中外学者不断地从中发现价值、吸取精华，使之成为历久常新、取之不竭的谋略宝库。

中国谋略典籍与现代成功智慧丛书

# 曾国藩兵法与领导艺术

# 术



宫玉振◎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ZENGGUOFANBINGFAYULINGDAOYISHU

柴宇球◎主编



一兵物  
一合三  
故李

# 曾国藩兵法与领导艺术

宫玉振◎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ZENGGUOFANBINGFAYULINGDAOYISHU

柴宇球◎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兵法与领导艺术/宫玉振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5.1

(中国谋略典籍与现代成功智慧丛书/柴宇球主编)

ISBN 7-80677-791-1

I. 曾… II. 宫… III. 曾国藩 (1811~1872) —领导艺术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8097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
印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广州市广花四路棠新西街 69 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2 插页
字数	200 000 字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
印数	1~5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77-791-1 / K · 33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 广州市合群一马路 111 号省图批 10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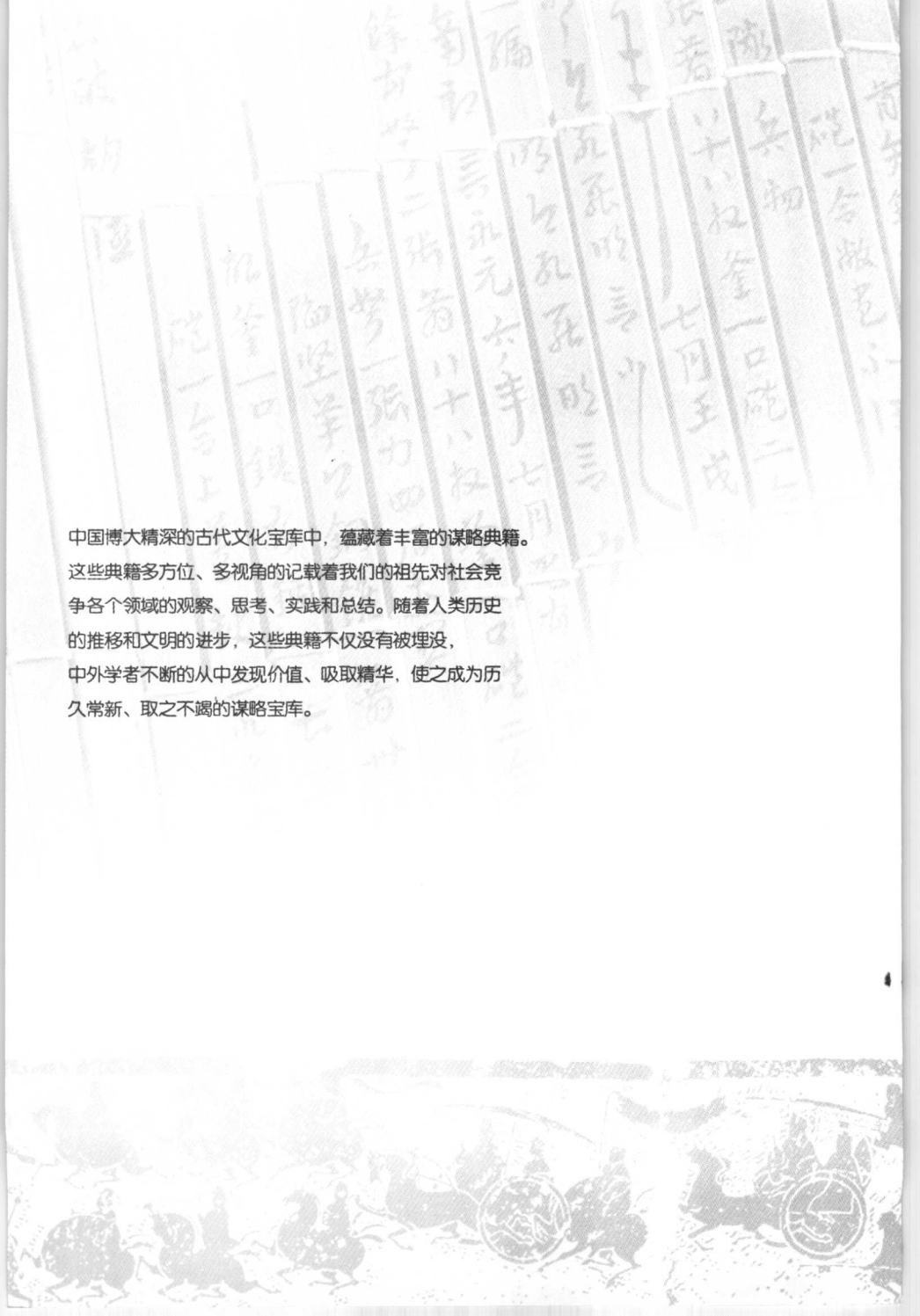
电话: [020] 83780718 83790316 邮政编码: 510100

邮购地址: 广州市东湖西路邮局 29 号信箱 邮政编码: 510100

(广东经世图书发行中心)


本社网址: [www.sun-book.com](http://www.sun-book.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宝库中，蕴藏着丰富的谋略典籍。

这些典籍多方位、多视角的记载着我们的祖先对社会竞争各个领域的观察、思考、实践和总结。随着人类历史的推移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典籍不仅没有被埋没，中外学者不断的从中发现价值、吸取精华，使之成为历久常新、取之不竭的谋略宝库。



# 总 序

翻开人类文明史，只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属于物质的部分随着时光的流逝和人类的繁衍，绝大部分物质成果已被岁月磨损或被人类自身消耗了，离现实越远古的物质成果就越稀少；属于精神的部分，则不断地积淀、翻新和发展，越聚越多，越古老的民族精神产品就越丰厚。

在人类的精神产品中，知识是主体部分，在知识类精神成果中，起骨干、支撑和灵魂作用的是智慧。谋略是智慧的升华和结晶。一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谋略的创造史和谋略的发展史，无时无刻不闪烁着人类智谋的火花。从战天斗地，赢得生存，到国家的治理、民族的振兴；从统军作战，克敌制胜，到发展经济、经营企业；从人际交往、外交活动、到统御之术、体育竞争，一个高明的谋略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常常很难以物质的价值来衡量。对谋略的研究和运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关于智慧谋略的名士、名著数不胜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景仰和赞叹。

在知识呈指数形式增长，甚至是“知识爆炸”的

今天，知识就是金钱，知识就是财富，有人甚至说今天是知识经济的社会，这是很有道理的。但这话还可以说得更确切一些——知识只有变成产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财富，知识到产品之间必须有智慧作桥梁，受到大众欢迎并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更需要智慧。在经济全球化、商场如战场的今天，再好的产品，如果没有谋略，没有巧妙、科学的营销方法，是卖不出好价钱的。没有经济谋略头脑，没有谋略的运筹和指引，产品本身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因此，今天的社会是知识经济的社会，更是智谋经济的社会，学知识，长智慧，添谋略是现代社会人们生存和发展之必需，有时甚至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

由于知识骤增，信息泛滥，各类书刊汗牛充栋。读书者如何走“捷径”，这是摆在每一个读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要想取得“学以致用，事半功倍”的效果，具备“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能力，要想达到“点石成金，触类旁通”的水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既要及时学习研究新知识，也不要忽视阅读那些经典著作，把求新和识古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把握规律，一通百通。《中国谋略典籍与现代成功智慧》丛书，为广大读者架设了一座“情通千古，理顺时代，智取未来，慧悟终生”的桥梁，让读者朋友们不断走向成功、走向辉煌。

中华民族以它那十分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谋略智慧，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开拓进取、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这既是古往今来文化传承的必由之路，也是世俗社会中物竞天择的现实要求。今天的信息社会，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正处在大变革、大转折的关键时刻，随着生活节奏的持续加快和生存竞争的不断加剧，客观时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把人类理论和实践活动推向新的境界，这为谋略智慧的开拓、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加丰厚的土壤和更加广阔的空间，正是谋略学的创造、

运用和发展的历史机遇。

薪尽火传，弘扬传统文化，义不容辞地落在后辈的肩上。将最著名的谋略典籍的精华部分与现代社会中人们创造的成功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让读者不仅能看见树木，还能通过树木看见森林；不仅领略古人施知用谋的成果，还能看到现代成功的实践和理论。《中国谋略典籍与现代成功智慧》丛书，就这样顺应时势而产生了。出版社特聘这方面研究的专家精心策划出版这套丛书，从中国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宝库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谋略典籍，多方位、多角度介绍名著的时代背景，阐述名著所蕴涵的谋略智慧，综述名著对当时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旨在启迪读者科学地学习谋略，深入地研究谋略，巧妙地运用谋略，提高读者的谋略水平和经营管理、决策运筹能力，依靠谋略指导行动，成就一番事业。

愿读者朋友在工作中勤奋学习，在学习中努力工作，不断长识添智增谋，继承和弘播文化宝库的文化遗产，创新和发展智慧谋略，在富民强国中多做贡献。

柴宇球

2003年3月于南京

## 导言：曾国藩的治兵方略与领导艺术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据说他还曾经建议干部们读一点曾国藩的著作。也许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股“曾国藩热”逐渐在社会上兴起。唐浩明的小说《曾国藩》的出版，更是将之推向了高潮，以至于社会上出现了“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曾国藩这个人，魅力究竟何在呢？

### 一

公元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小山村里。

曾氏祖籍湖南衡阳，清初时迁到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嘉庆十三年，也就是曾国藩出生前三年，他的祖父曾玉屏又把家迁到白杨坪。曾玉屏是一位在乡里很有威望的人物。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游惰不事产业，天天骑着马跑到湘潭，同一些纨绔子弟鬼混。后来曾玉屏接受别人的劝诫，卖掉马匹，徒步回家，从此终生未明而起，苦心治理产业，使曾家的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善。曾玉屏“声如洪钟，见者惮慑”，村里人很敬畏他。邻里发生纠纷，常常找他调解。遇到不服的，曾玉屏一发脾气，对方往往就神情沮丧，就此罢休，甚至还要带上酒登门道歉。曾国藩一生都对他的祖父很崇拜，认为曾玉屏的威仪言论雄伟非常，他与他的弟弟曾国荃虽然位至督抚，但威重智略远不如祖父，只是由于没有机会，才使他的祖父终老于山林而未能一展其志。曾玉屏教训子孙的话，如“以懦弱无刚为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等，也都成为曾国藩为人的座右铭。

曾玉屏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深以自己早年放荡弃学，没有取得功名为己憾，所以决心让自己的儿孙上学读书。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资质平平，直到43岁才考了个秀才，他自知才短，便将希望寄托于曾国藩兄弟。曾国藩不负祖父与父亲的期望，6岁入学，23岁考取了秀才，24岁考取了举人，28岁又考取了进士。之后参加朝考，又以一等第二名的成绩，被道光帝钦点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后庶吉士散馆，曾国藩以二等第十九名的成绩，被授为翰林院检讨，从此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

在7年的翰林院生活中，曾国藩博览群书，在诗赋文辞、经世之学、宋明理学等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历次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因而7年之内，便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4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可谓一帆风顺。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一是他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相当的声望；二是受到他会试时的座师穆彰阿的垂青。穆彰阿是当时权倾朝野的重臣，十分留意培植自己的势力，而曾国藩才干出众，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与赏识，并在道光皇帝面前推荐曾国藩“遇事留心”，曾国藩也就“翼翼向用”了。曾国藩虽然官运亨通，却不脱书生本色，对于当时的政治腐败、民间疾苦十分忧愤，曾多次上书皇帝，要求革除弊政，甚至将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即位不久的咸丰皇帝，但这些上书都石沉大海。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852年，曾国藩得到江西乡试考差，行至安徽太湖县小池驿时，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于是由九江乘船西上，回籍奔丧。同年12月，咸丰帝命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借此机会，改弦更张，创建了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湘军。1854年3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配合，夹湘江而下，东征与太平军

作战，从此开始了他的带兵生涯。1854年7月，湘军攻占武昌，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取的第一座省城，咸丰帝先令授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后收回成命，改授兵部侍郎衔。1854年12月，湘军攻克长江重镇田家镇。1855年2月，湘军在湖口惨败，曾国藩败走南昌。由于没有地方实权，曾国藩在江西受尽当地官员的排挤，军事上也很不顺手。1857年2月，处于困境中的曾国藩以父亲去世为名回籍奔丧。在家中的一年多，曾国藩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处事之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1858年7月，咸丰帝命曾国藩重新出山，办理浙江军务。1859年，曾国藩上《统筹全局折》，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对太平天国的用兵之策，提出先取安徽、次取江浙、力争上游、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并拟定了四路进兵之策，准备进攻安庆，迫使太平军与湘军进行决战。1860年，曾国藩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实授，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861年，湘军在苦战之后，取得了安庆会战的胜利，这是湘军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湘军的战略形势得到根本的扭转。1864年，湘军在经过长围久困之后，终于攻克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曾国藩本人也封太子少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他的声誉权位，也达到了极点。但曾国藩却审时度势，自翦羽翼，自削兵权，采取裁撤湘军、停解厘金、陈请九弟曾国荃开缺回籍等措施，解除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避免了历代功臣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命运，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1865年，曾国藩奉命率军赴山东镇压捻军起义，他提出防河之策，准备以静制动，镇压捻军，但由于清政府急于求成，加上湘军主力已经遣散，李鸿章的淮军不听指挥，他的剿捻战略无法实现。1866年，以剿捻无功，回任两江总督，剿捻事务交给了李鸿章办理。1867年，曾国藩补授体仁阁大学士。1868年，改授武英殿大学士，随后调

任直隶总督。1870年7月，曾国藩奉命处理天津教案，他虽然知道曲在洋人，但忍辱求和，备受清议讥评。9月，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病逝，享年61岁。清廷闻讣后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这也是“曾文正”三字的由来。

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正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剧烈的时代。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曾国藩作为一名僻远乡村的农家子弟，以书生带兵，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本人也封侯拜相，位极人臣，被推为中兴名臣之首。这样的经历，自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对曾国藩的评价，也曾经有几起几落。他被清政府誉为“中兴第一人”，他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偶像；他被反清的革命党人斥之为“汉奸”，他被新中国的史学家斥之为“卖国贼”。章太炎的一句话说得非常精当：“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如此矛盾的评价集于一人之身，这在历史上的确是不多见的。

今天，我们已经远离了曾国藩生活的年代。对于曾国藩，也就可以排除主观的情感和外在的标准，作出相对客观一些的评价了。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是不争的事实。“曾剃头”、“刽子手”这些恶谥，是曾国藩无论如何也洗刷不掉的。这是评价曾国藩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历史又是十分复杂的。曾国藩这个人，毕竟是在传统文化中浸润出来的，他的身上，既有封建的糟粕，也有传统的精华。抛去他的阶级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悟透了中国文化的人，他的为人行事，也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影响。他的以天下为己任，明显体现出儒生的进取精神；他的“花未全开月未圆”、“晚场善退”，明显体现出道家的影响；他的治乱世用重典，学的是所谓的“申商之术”；他的俭以奉身、勤以

治事，夙夜匪懈，则明显体现出禹墨的影响。儒、道、法、墨四家的思想，在曾国藩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曾国藩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他非常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他讲究人生态度，讲求精神境界，讲求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他的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修身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他以一介儒生，居然将燃烧了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烈火给扑灭了下去，这其中自然也有他成功的经验。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但又绝对不是一个书呆子。毛泽东曾经说：“愚于近人，独服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设使易以他人，岂能若是？”陈毅元帅也说过：“曾国藩用兵很有一套，在军事上很值得研究。”其实何止是军事，曾国藩为官一生，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当然他的“天下”毕竟是清王朝的“天下”），他的忧患意识，他的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精神，他在逆境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尤其是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概括的人，他在不经意中留下的许多话，充满了哲理性，可以说既是他一生的经验总结，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之所在。这些话，完全是可以当作格言来读的。毛泽东在论述如何继承传统时提出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曾国藩，我们同样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

## 二

曾国藩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他的治兵方略，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是，曾国藩善于从历史和现实中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注意吸收和继承中国传统治兵方略的精华，尤其曾国藩是以理学家的身份谈

兵的，理学是其兵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这种浓厚的理学背景使得曾国藩对中国传统兵学做出了全新的诠释，并提出了大量极富理学意蕴的兵学命题。这些命题深深地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体现了理学思想的深刻性。这一点，在集中反映他的治兵方略的兵书《曾胡治兵语录》中有充分的体现。

《曾胡治兵语录》，是蔡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军、用兵方面的言论而编成的一部语录体兵书。蔡锷（1882~1916年），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军事家，1904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训练新军。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蔡锷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等革命党人在昆明起义响应，组织了“大中华民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军都督。1913年，袁世凯调蔡锷入京，任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并授以将军府昭威将军。1915年，袁世凯帝制野心暴露，蔡锷潜出北京，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出兵讨袁。他抱病亲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纳溪等地。1916年，蔡锷因积劳成疾，赴日治疗，是年病逝于日本福冈大学医院。

1911年，蔡锷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统领，负责新军的训练工作。数年的军中生活，使他亲身体会到所谓的“新军”，依然是风气败坏，纪纲废弛。正好19镇统制钟麟同委托他编写一份“精神讲话”的教材，蔡锷认为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于是便从他们的奏章、函牍和日记中，摘取要言，分类凑辑，取名《曾胡治兵语录》，以此作为云南新军的“精神讲话”。全书共十二章，前十章论治军，后两章谈作战。蔡锷并在各章之后附有按语，或概括归纳本章内容，或对曾胡言论进行评述，或者是借题发挥，阐明蔡锷自己的思想。

曾、胡二人，同为湘军将帅，同为理学家，其治兵方略十分

接近。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对曾国藩治兵思想的补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曾国藩的治兵思想。因此《曾胡治兵语录》虽非曾国藩一人之言论，但仍然可以视为全面反映曾国藩治兵方略的主要著作。加之这部兵书是以语录体的形式出现的，言简意赅，以最小的篇幅，反映了曾国藩治兵方略的精华，因而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反映曾国藩治兵方略的最好著作。

从《曾胡治兵语录》来看，曾国藩的治兵方略主要是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的。

### 1. 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将帅观

中国历代兵论，首重将帅的地位与作用。《孙子·谋攻篇》中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是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的这一认识，实际也是历代论将的共识。《吴子·论将》认为“得之国强，去之国弱，谓之良将”。《六韬·论将》认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其他诸如此类之言论，可谓比比皆是。正因为将帅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成败，国家的安危存亡，所以历代的兵论，对于将帅所应具备的素质，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孙子》认为将帅应该具备“五德”：智、信、仁、勇、严；《吴子》认为将帅应该做到“五慎”：理、备、果、戒、约；《六韬》认为将帅应当具备“五材”：勇、智、仁、信、忠。“五德”也好，“五慎”也好，“五材”也好，都是要求将帅应具备全面的素质。

曾国藩同样要求对将帅做全面的考察。曾国藩提出了四个条件：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急名利、耐受辛苦；但是在曾国藩看来，这些条件并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有次，有本有末。曾国藩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胡治兵语录·将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将“忠义血性”，作为“为将之道”的前提的。对忠义、

血性的强调，是曾国藩将帅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地方。

忠义、血性，都是与理学有关的范畴。所谓的血性，指的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一种刚健而淳朴的冲动；所谓的忠义，则指的是由“血性”而激发出来的一种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其实质，就是政治上的自觉性。以“忠义血性”为“为将之本”，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兵论不同于传统兵学的理学思想背景。曾国藩不是从军事出发谈军事的，也不是从政治、经济出发谈军事的，他的出发点是理学中的核心范畴之一：“人心”。曾国藩是以书生从戎，“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所面临的处境十分险恶。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正是封建王朝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中，官吏渎法贪冒，柔靡浮滑；士子不知廉耻，唯利是求。流波所及，军队之中，将帅贪婪平庸，士卒望敌而走。按照曾国藩的说法，这些人都已经“丧尽天良”了。而从理学的角度来说，军事的衰败只是一种表象，它的实质是人心的衰败；军事的失败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陷溺。曾国藩所说的“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曾胡治兵语录·尚志》）即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想挽回王朝的衰败命运，因而也就不仅是军事的问题，而是根本的人心问题。对于投身于这场大搏斗中的地主阶级来说，也就不仅仅应当具备军事素质，更需要具备卫道的精神。曾国藩由此认为，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来激发天良，改变人心，号召那些“抱道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狂热，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挽救封建王朝、封建文化，恢复已经被打破的社会秩序的“事业”中去。只有忠义血性之士，才能自拔于流俗，能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和卫道精神，“塞绝横流之人欲”，“挽回厌乱之天心”，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军事上的衰败。

（《曾胡治兵语录·尚志》）

以“忠义血性”为将帅之本，体现了曾国藩对晚清这场军事斗争的实质的深刻理解，而这种深刻性显然与其理学的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曾国藩“忠义血性”的号召下，湘军将帅确实表现出了相当的凶悍性格。《中兴将帅别传》说曾国藩“履危濒死屡矣，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挫而其气弥厉”，江忠源“每战亲临阵，踔厉风发”，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灭‘贼’自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竟然“敢战胜于勇悍愚夫”，与“忠义血性”的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

曾国藩所说的“忠义血性”，显然是以封建伦常为实质的，是有其鲜明的政治属性的。但是，它也确实实地提示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对于将帅而言，政治理念以及由此产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具有核心性的地位，从而把将帅的政治素质与政治信仰的重要性空前凸现了出来。对于曾国藩这一“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命题，编撰《曾胡治兵语录》的蔡锷十分欣赏，认为与古今中外的兵论相比，“尤为扼要探本之论”（《曾胡治兵语录·将材·蔡按》）。蔡锷并将其中的忠君卫道的内容转换为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从而为这个命题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对这一命题的揭示，在中国兵学的发展上，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

## 2. 以“诚”为核心的治军观

历代杰出的兵家，都十分重视诚信在治兵中的作用。孙子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信是将帅所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智。《臣轨·良将》的“将不诚信，则卒不勇”，可以作为孙子的注脚。明代以后，诚信更受兵家重视。《百战奇略·信战》认为“上好信以任诚，则下用情而无疑，故战无不胜”；戚继光《练兵实纪》认为，主将“至诚待下”，则



“万人一心，所向无敌”，等等。

如果说在历代兵论中，诚信还只是一种对将帅修养的要求，是一种带兵之方，那么在曾国藩的思想体系中，则上升到了世界观和道德观的高度上。在曾国藩看来，“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曾胡治兵语录·诚实》）在这里，“诚”被看成了化育天地的源泉，立国立业的根本。同时，“诚”也被视为道德的最高境界：“果存诚而不欺，则圣学王道岂又有他哉！”

曾国藩的这一思想，是典型的“儒者之言”。“诚”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四书之一的《中庸》中就已经提了出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在天下之化育。”曾国藩的独到之处，则在于将“诚”这个儒学的范畴引入了兵学之中，从而使将帅修养之一的“诚”字，被赋予了大本大原的最高地位，这就将“诚”在兵学体系中的价值空前地凸现了出来。

这种引儒入兵、从而改造兵学的范畴和体系的模式，是把握曾国藩治兵方略的出发点。以“诚”而言，其在曾国藩的兵论中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个层次，是“精诚”。曾国藩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曾胡治兵语录·诚实》）所谓的精诚，所谓的在己之诚，就是对于所要从事的事业的一种毫无保留的信念。按照儒家的逻辑，“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只要人在主观上具备了这种“至诚”的信念，就可以具有一种主宰宇宙和历史发展的力量。应当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唯意志论，但其中又体现了儒家对主体力量的自信，对进取精神的崇尚，对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作为理学家，曾国藩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而在“天下大乱，人怀苟